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24.03.003

张弛：“‘复合竞争’时代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分化”，《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3期，第34-48页。

ZHANG Chi,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trategic Choices of Middle Power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in the Era of Comprehensive Competition”, *Pacific Journal*, Vol.32, No.3, 2024, pp.34-48.

“复合竞争”时代印太“中等强国” 战略选择的分化

张弛¹

(1.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201701)

摘要:美国推出“印太战略”拉开了中美“复合竞争”的序幕。随着大国竞争烈度的增强,国际秩序分裂和集团化倾向的加剧,科技和供应链能力之争的凸显,印太域内的“中等强国”面临越来越大的“选边站”压力,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上亦出现了分化。究其原因,首先,国内层面的官民认知偏好和身份认同两个因素决定了“中等强国”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偏好;其次,国际体系层面的供应链依赖结构以及是否具有对冲大国压力的制度缓冲影响着选择偏好的极化程度。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三国的政策印证了“中等强国”战略选择背后的逻辑。因此,中国应通过在印太“中等强国”国内营造对华友善的认知,推动“亚洲认同”在区域内的扩散,提供更多元化的供应链选择以及继续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地区秩序,努力促使印太“中等强国”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中立甚至倾向中国,构建有利于我国的国际关系和战略环境。

关键词:印太;“中等强国”;“复合竞争”;战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24)03-0034-15

自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后,美国开始部分地调整后冷战时期长期秉持的对华“接触+遏制”的政策,两国关系呈现“相互依存的竞争”。^①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推出“印太战略”后,美国加大了对华制衡的幅度和力度,开启全面对华竞争。此后拜登(Joseph Biden)虽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但承袭了“印太战略”的基本思路,并于2022年2月发布新版《美国印太战

略报告》。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版“印太战略”在制衡中国时更强调美国同盟与伙伴网络的整合,统筹安全、经济、技术、价值观等领域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竞争,两国关系进入了“复合竞争”的新阶段。这种竞争不仅对印太域内各国造成了冲击,也引发了它们的担忧。在这些国家里,“中等强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一方面,尽管与中美在实力上存在较大差距,但“中等强国”都是区域内实力较强的国家,其政策倾

收稿日期:2023-08-09; 修订日期:2023-10-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韩国对中国的认知轨迹变化与中韩关系发展策略研究”(20CGJ0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弛(1986—),男,河南洛阳人,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战略。

* 作者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 金灿荣、刘宣佑、黄达:“‘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5期,第6页。

向对中美竞争的影响颇大；另一方面，虽然“中等强国”难以单独应对中美竞争，但是它们联合起来的力量却不容小觑，甚至会对印太秩序的变革或重构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拟从厘清印太“中等强国”的范围和“复合竞争”的特征入手，通过搭建一个国内政治因素和国际体系因素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以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三个国家为案例，剖析引发印太“中等强国”在中美之间战略选择发生分化的原因，并阐释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一、核心概念阐释

1.1 “中等强国”概念之争与印太“中等强国”的厘定

早在中世纪的欧洲，意大利哲学家乔瓦尼·波特罗(Giovanni Botero)最早提出了“中等强国”的概念，他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帝国”“小国”和“中等强国”三类。^①然而迄今为止，何谓“中等强国”？哪些国家属于“中等强国”？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在学术界内仍存在较大的争论。从既有研究来看，对“中等强国”概念的界定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

一是基于实力等级的“中等强国”。这种视角关注“中等强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等级，认为“中等强国”是在实力上次于大国(包括次大国)，但却强于其他小国的国家。然而，对于实力的评判，不同的学者或机构却存在不同的标准。约翰·巴顿(John W. Burton)和威廉·施耐德(William Schneider)都比较注重工业与核能力的作用，认为“中等强国”是完成了工业化或半工业化，已经拥有或在5-15年内将会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以外的国家。^②除了领土、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军事规模等物质力量外，还有部分学者把地缘政治因素也考虑了进去，认为“中等强国”不仅表示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物质能力，还涉及地缘政治地位。^③据此，一些学者或机构选取了部分指标，对“中等强国”进行界定。如孙西辉就基于人口规模、国土面积、经济总量和军事开支四个主要指标再加

上主观感知因素确定了14个“中等强国”。^④不过，正因为指标的不同，基于实力选取的“中等强国”存在难以统一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情况，无法解决“中等强国”概念中存在的模糊性与矛盾性问题。

二是基于外交行为的“中等强国”。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实力是“中等强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还需注意国家在外交政策中体现出的行为。劳拉·尼克(Laura Neack)主张“中等强国”通常通过建立联盟、充当调解人和“中间人”、参与国际冲突管理与联合国维和等行动，帮助维持国际秩序。^⑤罗纳德·贝林格(Ronald Behringer)进一步将“中等强国”的外交行为特点总结为三方面：国际人道主义、“利基外交”(niche diplomacy)以及合作解决人类安全问题。^⑥尽管根据外交行为来界定“中等强国”的方法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权力视角下“中等强国”概念中存在的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如为何一些拥有中等权力的第三世界国家未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与实力相匹配的作用；但该定义似乎并不能解释传统“中等强国”(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与新兴“中等强国”(如南非、土耳其等)在外交行为上的明显差异。

三是基于角色建构的“中等强国”。这种概念界定方式倾向于先判定“中等强国”的特有身

^① Giovanni Botero, *The Reason of State*, Routledge, 1956, pp. 3-4.

^② John W. Burt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eneral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05; William Schneider Jr., "The French Nuclear Force and th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Prospects for Medium Powers Independent Nuclear Deterrent", *Arms Control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1, 1969, p.73.

^③ Chapnick Adam, "The Middle Power",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Vol.7, No.2, 1999, pp.73-82.

^④ 孙西辉：“中等强国的‘大国平衡外交’——以印度尼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为例”，《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9年第6期，第6-15页。

^⑤ See Laura Neack, "Middle Powers Once Removed: The Diminished Global Role of Middle Powers an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1st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vention, Los Angeles, March 2000.

^⑥ Ronald M. Behringer, "Middle Power Leadership on the Human Security Agenda",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0, No.3, 2005, pp.307-312.

份,再根据这种身份特质来划定“中等强国”的范围。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中等强国”不仅需要外部承认,而且需要建构自我认同。与大国不同,“中等强国”并不具有某些特殊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对“中等强国”身份的追求和自我识别就成为明确其概念的关键。通常传统的“中等强国”都会赋予自身“国际好公民”的身份,包括尊重国际法、遵循多边主义原则、追求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目标、积极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与国内政策一致的国际身份。^①不过,这种界定方式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其一,考克斯(Robert Cox)曾指出:“中等强国的角色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国际体系变化的背景下不断被重新思考的。”^②把“中等强国”与特定国际身份联系起来实际上是以静态视角来界定“中等强国”。其二,“国际好公民”的身份与一些“中等强国”的外交行为会出现背离,譬如澳大利亚近年来愈发倒向美国和偏离全球多边主义的姿态等已经对其“国际好公民”身份形成挑战。其三,“国际好公民”本身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以至于会将某些基于地缘政治和对霸权依附的政策给予道德解释,^③使其身份与行为日益脱节。

总之,单一依靠物质权力、外交行为或身份认同来进行定义都容易出现矛盾或偏颇。因此,本文在界定印太“中等强国”时,采用综合以上三种路径的方法:首先根据一定指标选出在实力上属于“中等强国”的国家,然后观察这些国家的外交行为是否带有典型的“中等强国”外交色彩,最后印证它们的外交话语建构中有没有赋予自身“中等强国”的身份,最终确定研究对象的范围。

在实力等级层面,本文参考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发布的“亚洲实力指数”(The Asia Power Index)^④来粗定印太“中等强国”的范围。该指数依据资源和影响力两方面的8个指标来评估26个印太国家的权力,将得分在70分以上的国家称之为“超级大国”,在40~70分区间的国家称之为“主要大国”,在10~40分区间的国家称之为“中等强国”。从

2020—2022三年的指数来看,美国和中国一直矗立于“超级大国”之林;印度、俄罗斯、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朝鲜始终稳定地处于“中等强国”之列;而日本尽管自2021年后便归于“中等强国”的范围,但此前其属于“主要大国”的水准,所以本文暂不将日本纳入印太“中等强国”的考察对象。

在外交行为上,俄罗斯秉持大国外交的思路,实行与中、美对等的外交战略,“中等强国”外交色彩并不鲜明。朝鲜虽在榜上敬陪末位,但拥核国的特殊身份使其对外亦摆出大国的姿态,始终坚持与美国平等对话的地位。根据外交行为特点,可以进一步将洛伊版“中等强国”榜上除去俄罗斯和朝鲜。印度近年来虽极力推动大国外交,但其在中美俄之间左右逢源以及积极与日、澳等国构建伙伴关系的行为却带有典型的“中等强国”外交色彩,故暂时将印度保留在“中等强国”之中。

在身份认同上,印度自尼赫鲁时代就宣称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崛起,其更以“潜在超级大国”和“南亚霸主”自居,不甘自降身份于“中等强国”之列。巴基斯坦虽常被外界认为是“中等强国”,但其本国的外交表述中罕见“中等强国”的自我认定。新西兰鉴于强邻澳大利亚给自身定位为放眼亚太的“中等强国”,所以甚少给自己贴上同样的标签。东盟中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或以“中等国家”自居,但它们并不把自己等同于与澳大利亚、印尼等相匹敌的“中等强国”。故此,印太“中等强国”的名单上还剩余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印尼、越南5国。不过新加坡、印尼和越

^① Gabriele Abbondanza, “Australia the ‘Good International Citizen’? The Limits of a Traditional Middle Pow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5, No.2, 2021, p.181.

^② Robert W. Cox, “Middlepowermanship, Japan, and Future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Canada's 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Analysis*, Vol.44, Issue 4, 1989, p.825.

^③ 沈陈:“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4期,第7页。

^④ See “Asia Power Index”, Lowy Institute,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rograms-projects/asia-power-index>.

南虽同属东盟成员国,但印尼是东盟第一大国与领导核心,其“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东盟未来的发展”。^①考虑到东盟国家在大国竞争中面临相类的战略环境和偏好相似的外交策略,在三个东盟的“中等强国”里,本文以印尼为代表,与澳大利亚、韩国共同作为印太“中等强国”的考察对象。

1.2 “复合竞争”的特征

自“亚太再平衡”战略拉开美国对华竞争的序篇以来,中美竞争至今已经历了从“相互依存的竞争”到“复合竞争”两个阶段。“相互依存的竞争”始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终于“印太战略”的出台,基本特点是虽然“竞争”为中美关系的关键,但“竞争”并非“敌对”或“对抗”,中美竞争受限于双方不可避免地相互依赖的现实。^②在“相互依存的竞争”下,中美互动还是呈现“斗而不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双方无意割断彼此间的联结,试图将竞争的范围限制在一定的领域内。然而,以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为标志,中美竞争开始转入“复合竞争”的阶段,其与“相互依存的竞争”相比,存在以下不同之处。

一是大国竞争的烈度显著提升,对抗性愈加突出。与“相互依存的竞争”相比,“复合竞争”的对抗性更强,中美关系总体上消极互动态势突出,不确定性上升,战略博弈的边界尚不清晰。^③进入“复合竞争”时代后,美国对华认知不断负面化,从过去“潜在的战略竞争者”“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转变为“头号竞争对手”“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此外,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极化,民粹主义、反华情绪显著提升,对华强硬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的一致共识。受其驱动,美国对华打压的范围更广泛、手段更凶狠,在台湾问题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断挑衅,导致两国关系有从“竞争”滑向“对抗”之虞。

二是相互依赖不再是大国竞争的前提,“去风险”反而成为竞争的前置条件。在“相互依存的竞争”之下,尽管大国会在政治、安全等领域

出现矛盾纷争,但经济上依然往来不断、联系密切,相互依赖是竞争的前提。然而到了“复合竞争”时代,本应是缓和冲突的相互依赖反而越发“武器化”,^④大国对自身在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更为敏感,如何规避脆弱性引发的风险成为当务之急。自2023年美西方国家首次提出“去风险”的概念后,它们以“风险”来污名化中国,试图通过强化美西国家间的合作来孤立中国、“竞赢”中国。“去风险”实质上是一种“精准脱钩”,其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体系的目标始终如一,加剧了国际秩序的阵营化态势。

三是大国竞争不再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之争,而是对是否维持现秩序的态度之争。“相互依存的竞争”的另一重要前提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支持。一旦危机出现,大国之间为了现有秩序的存续,会缓和竞争并选择合作。不过,迈入“复合竞争”阶段后,美国愈发认为现行国际制度的双赢属性与其单边诉求难以匹配,由于无法在现制度下获得预期的收益,美国选择建立排他性的新制度体系以维持自身的影响力。^⑤而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历来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⑥中国希望现行国际秩序保持总体稳定,也愿对国际秩序的发展、改革和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⑦中美两国对国际秩序是否要“破旧

^① Amitav Acharya, *Indonesia Matters: Asia Emerging Democratic Power*, World Scientific, 2015, p.57.

^② Ryan Hass, *Stronger: Adapting America's China Strategy in an Age of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90.

^③ 吴心伯:“探索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2期,第43页。

^④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4, No.1, 2019, pp.42-79.

^⑤ Stacie E. Goddard, “Embedded Revisionism: Networks, Institutions, and Challenges to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2, No.4, 2018, p.765.

^⑥ “王毅: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22年9月25日, https://www.mfa.gov.cn/wjzbhd/202209/t20220925_10771174.shtml.

^⑦ 达巍:“现行国际秩序演变的方向与中国的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108页。

立新”的态度之差会使大国愈发难以围绕全球性问题展开合作,国际秩序发生断裂的可能性也有所提升。

四是科技之争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要害在于关键供应链的能力之争。与传统大国竞争聚焦军事、经贸、意识形态等领域不同,新一轮科技革命是“复合竞争”时代的关键因素,能否在高科技领域拔得头筹,不仅决定大国能否在经济发展中占得先机,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①而半导体、清洁能源、生物制药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其背后的产业链息息相关,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断供”危机更刺激了大国提升供应链韧性的紧迫性。拜登刚一上任就发起为期百日的供应链审查,加快全球供应链重组,联合盟友构建排华的供应链体系。有鉴于此,中国也加大了本国供应链安全和韧性建设,强化与友好国家的合作,努力破解美国试图孤立中国的企图。

鉴于上述“复合竞争”的特征,“中等强国”面临着严峻的战略选择困境:在“相互依存的竞争”的时代,由于承认相互依赖和现秩序的合理性,大国关系的竞合两面都比较凸显,所以“中等强国”可以在大国间发挥协调或仲裁的作用,在国际政治中扮演比较积极的角色。不过,“复合竞争”不仅导致“中等强国”的外交空间受到明显压缩,而且受到大国强迫其“选边”的巨大压力,表现出外交灵活性的削弱和战略选择的分化。

当前印太地区的“中等强国”在“复合竞争”下的战略选择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第一,明确的战略“选边”,主要是积极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对中国进行制衡,如澳大利亚。第二,有保留的战略“选边”,对中美两国中的一方具有相当的靠拢偏好,但规避与另一方冲突和割裂,如韩国。第三,在中美之间实施平衡外交以努力确保相对独立的地位,如印尼。三种选择偏好的出现,不只是以“复合竞争”为特征的国际体系衍生的结果,而且与国内政治因素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下文拟搭建一个国内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互动作用的框架,来解释印

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分化的原因。

二、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分化中的内外因素及其互动机制

2.1 影响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内外因素

在对外政策分析中,国内政治和国际体系是通常会被考虑的两个重要维度。国内政治维度包括制度性变量(国体、政体等)、行为体变量(个人、集团等)、观念类变量(国家偏好、国民精神等)等,国际体系维度则涵盖结构性变量(国际权力分配等)、制度性变量(国际机制等)等。某一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到底是国内政治因素还是国际体系因素更重要,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来讲,外交政策的制定基于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确定,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是自下而上的方式,都关注国内各行为体的偏好及其互动,进而为国内政治决定外交政策的分析路径提供详细的解释。不过,国际体系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亦是毋庸置疑:不仅影响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还为对外政策划定了一定的边界。综上,在研究印太“中等强国”在中美间的战略选择时,跨层次分析十分必要,“中等强国”的最终抉择是在国内因素和体系因素两者相互作用之下产生的。

(1) 国内因素

影响“中等强国”战略抉择的国内因素首推国内认知偏好,具体指一国内部在中美“选边”问题上态度偏好,主要由领导层意向和民意两种认知互动而构成。领导层意向源于政党(主要是执政党)和领导人的利益偏好。对于政党及其精英(包括领导人)而言,维护执政地位和政权延续是最重要的利益考量。所以他们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本政党和领导人个人的利益偏好常常会被纳入考量之中。除了领导层的偏好外,民意动向也是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

^① 周琪:“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正改变大国战略竞争的主要模式”,《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期,第1页。

虽然政党和领导人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利益毕竟与广大国民的利益尚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旦政党和领导人的利益与民意发生较大的背离,基于前者利益而制定的政策就容易受到民意的反噬,为政策的制定圈定了某些外围界限。因此,国内认知偏好是领导层意向和民意互动博弈后产生的,两种认知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领导层在决策时既要充分考察和了解民意,又会通过宣传、动员等政治手段来引导民意;而民意虽受领导层意志的左右,但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并可以通过媒体舆论等对领导层施加影响。因此,若领导层意向和民意一致时,国内认知偏好较为凝聚,在中美“选边”上的态度相对明确;但若领导层和民意发生冲突时,国内认知偏好难以统一,在中美战略选择上的态度就相对模糊。

外交政策的制定虽基于国家利益,但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国家利益的界定取决于国家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建构主义认为确定身份是了解利益的前提,进而才能决定在对外关系中采取何种行动。随着大国互动进入“复合竞争”时代,价值观外交的全面回归导致国际社会因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呈现分裂和阵营化的态势,这使得印太“中等强国”的身份认同受到新的挑战。一方面,印太“中等强国”地处亚洲或亚太地区,具有“亚洲认同”——即对以多样化、软约束、发展导向为区域一体化特点的“亚洲方式”,主张社会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经济发展优先个人自由的“亚洲价值”,强调文明互鉴、友好交往的“亚洲叙事”的一致认可,代表着亚洲国家希望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叙事、西方发展模式的道路,构建有独特地域色彩的“亚洲共同体”的共同诉求。另一方面,部分印太“中等强国”因与美西方国家的特殊联系,在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等方面受到它们的影响,怀有“西方认同”情结。“亚洲认同”与“西方认同”之间的博弈对“中等强国”的外交选择亦影响显著。因此,身份认同与国内认知偏好一起构成了左右“中等强国”在大国间进行战略选择的两个主要国内因素。

(2) 体系因素

在强调国内因素之外,亦不能忽视国际体系的影响。国际体系会产生外部压力,迫使或引导国家调整或改变对外政策。尤其是“相互依存的竞争”转入“复合竞争”后,大国竞争烈度显著增强,对“中等强国”的压力进一步增大。在此背景下,“中等强国”与中美两国的依赖结构和是否具有制度缓冲成为其应对体系压力、最终塑造战略选择的关键。

由于实力间的差距,印太“中等强国”往往同时依赖于中美两大国,但它们对两国的依赖程度却不同。进入“复合竞争”阶段后,鉴于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成为各国应对各种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关键,居于大国竞争的核心地位。所以本文在分析“中等强国”的依赖结构时,将其在关键供应链领域对中美两国的依赖程度作为主要指标来考察。通常,印太“中等强国”在关键供应链上对中美两国都存在一种“不对称依赖”,这也成为中美能够对其施加影响的重要权力来源。不过,“中等强国”对中美任何一方的供应链依赖程度,都受到另一方产业能力的影响。^①若“中等强国”在受到美国施压时,中国能够提供替代方案,意味着该国对美国的不对称依赖程度低,美国对其影响有限,在面临“选边站”压力时能够采取两边站队的政策;反之则对美国的不对称依赖程度高,中国难以取代美国影响,该国在战略选择时亦倾向于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除了依赖结构外,国际制度也是“中等强国”可以借助用以对冲国际体系压力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国际制度容纳并整合了多个国家,“中等强国”可以在制度框架内寻找在应对大国竞争议题上“志同道合”的伙伴,协调立场、发出一致声音,抵御大国要求“选边站”的压力;另一方面,不少国际制度本身就包含大国在内,在国际制度围绕的议题领域内,大国总要开展一定

^① 赵懿黑：“大国科技竞争背景下韩国的政策选择：三边关系下的非对称依赖关系分析”，《国际论坛》，2023年第3期，第80页。

程度的合作,这为缓和大国竞争创造了条件。以东盟为例,它所提供的多边框架不仅为中美在东亚的互动提供了重要的接触平台,而且把大国竞争最大程度地限制到地区制度和规范的范围之内,为东亚地区的相对和平创造了一定的条件。^①因此,“制度缓冲”可视为国际体系层面另一个影响“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因素。积极、深度参与国际制度的“中等强国”比孤立或疏离于国际制度的国家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中等强国”参与自主性较强的国际制度比参加依附性较强的国际制度(如不对称同盟)有更强的战略依托。

2.2 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形成机制

在选取国内因素和体系因素的基础上,本文搭建起一个内外因素互动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中美竞争时代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分化的路径。

(1)国内认知偏好与国家身份认同初步塑造印太“中等强国”在大国间战略选择的基本取向。一方面,国内认知偏好由“中等强国”领导层意向和民意综合分析得出。由于国家领导人往往出身于执政党阵营,他的个人偏好会带有浓重的政党色彩。所以,印太“中等强国”执政党对中美两国的态度是厘定领导层选择的核心指标。执政党亲美则该国可能偏向于附和美国的对外政策,保持中立或友华则该国倾向于实

行平衡外交。另一方面,民意动向主要通过民意调查的结果来反映。^②本文利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洛伊研究所、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和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发布的民调报告来观测。若有直接问及受访民众在中美之间选择偏好的问卷,即可以用该结果来进行判定。若没有这一问题,则可以参考民众分别对中美两国的好感度、威胁感知、影响力等指标来综合分析“中等强国”内部民意是倾向美国还是偏好中国。梳理出领导层意向和民意走向后,再综合分析得出国内认知偏好。若领导层意向和民意一致,该国的选择偏好就非常明确;但若两者有所冲突,则该国的选择就会带有一定的模糊性。

身份认同与国内认知偏好的情况类似,若“中等强国”对西方阵营具有强烈的身份认同,向美靠拢的意愿就相对明确;若坚持亚洲的主体意识,则强调区域优先,规避在中美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需要注意的是,部分“中等强国”是“西方意识”和“亚洲意识”兼而有之,那么其战略选择的定位就游离于“亲美”与“平衡”之间。综上,由于印太“中等强国”在国内认知偏好和国家身份认同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在大国间选择时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态势。

表1 国内因素对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影响

		国家身份认同	
		“西方认同”	“亚洲认同”
国内认知偏好	亲美	明确倒向美国	有限倾向美国
	平衡中美/友华	“亲美”与“平衡”兼顾	大国平衡或友华政策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2)作为体系层面的因素,依赖结构和制度缓冲会对“中等强国”战略选择取向的强弱程度产生影响。具体而言,进入“复合竞争”阶段后,大国竞争的烈度较过去有了显著提升,开始限制相对较弱的“中等强国”的策略选择。^③在“选边”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等强国”对

^① 史田一:“地区风险与东盟国家对冲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99-100页。

^② 当然,不同民调机构受国内政治环境、机构本身政治色彩等因素影响,会在问题、参数等设置上有一定的倾向性,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民意。但民意调查是了解社情民意最直接的手段,能够反映民意大致倾向,故本文在分析民意走向时,暂时参考部分机构发布的民调来加以研判。

^③ [美]J.詹姆斯·金著,石延芳译:“韩国在中美安全竞争间的选择”,《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4期,第30页。

中美的依赖结构会左右其基于国内因素而产生的选择偏好,对美不对称依赖程度高的国家会进一步增强与美国的关系,对华不对称依赖程度高的国家则能坚持平衡或友华的政策。而制度缓冲也会对“选边”压力发挥一定的对冲

作用——拥有较强制度缓冲的国家能够抵消部分甚至全部压力,维持其原有战略选择或是只进行微调;相反,缺乏制度缓冲或是缓冲能力不足的国家就难以应对压力,政策偏好日益走向极端化。

表2 体系因素对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影响

		制度缓冲	
		弱	强
依赖结构 (关键供应链)	对美不对称 依赖程度高	亲美偏好强化	依托多边制度 维持既有立场
	对华不对称 依赖程度高	友华立场巩固	依托多边制度 维持既有立场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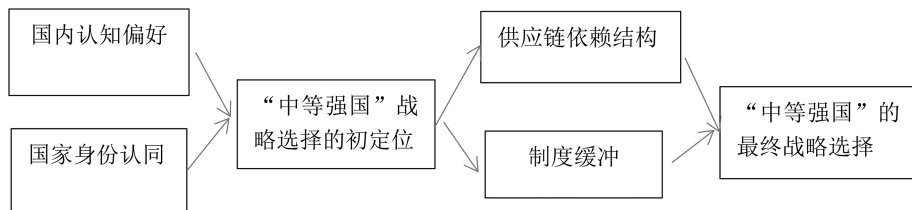


图1 印太“中等强国”在中美间战略选择的形成机制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从以上两层次因素对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作用综合来看,首先是国内层次的因素对它们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起主要作用,国内认知偏好和国家身份认同两个因素相互博弈,初步确定了“中等强国”在中美间的选择偏好,然后体系层面的因素会对初定位产生压力,使之进一步在中美两方的光谱间发生位移。而“中等强国”对中美两国的供应链依赖结构,以及其是否拥有制度缓冲、拥有多大韧性的制度缓冲将对位移的程度产生重要影响。

三、案例验证：“复合竞争”时代印太“中等强国”的不同战略抉择

基于对影响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分析,笔者将根据上文择定的三个“中等强国”代表,逐一阐释它们在中美竞

争中做出选择的背后逻辑。

3.1 澳大利亚:从“两面交好”到“联美制中”

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美澳三边关系以2016年为转折点,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努力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来对待。一方面,美澳同盟一直不断发展,澳大利亚通过小心翼翼地推动同盟的有限升级来缓解安全焦虑、提升外交地位,^①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发挥“南锚”的作用。另一方面,澳大利亚逐步扭转强硬的对华政策基调,转而强调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②使中澳关系特别是经贸往来有了长足的发展,

^① 许善品、张涛：“联盟困境、理性选择与澳美同盟的有限升级”，《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第107页。

^② David S.G.Goodman, “Australia and the China Treat: Managing Ambigu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30, No.5, 2017, pp.776-779.

中澳贸易规模超过美澳、日澳贸易之和。澳大利亚既搭了美国安全的“便车”，又乘上了中国经济的“顺风车”，达到了“两面交好”的效果。不过，自2016年起，尤其是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后，中美澳三边关系发生显著变化。澳大利亚不仅积极配合美国在印太的战略部署，充当制衡中国的“急先锋”，而且频繁挑起与中国的矛盾，导致中澳关系大幅倒退。

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之所以从“两面交好”转向“联美制中”，从国内因素看首先是国内认知转变的结果。2013年澳大利亚发生政党轮替，自由党—国家党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党”）击败工党开启了近10年的执政。在对外政策上，与工党重视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以及提倡多边主义和国际主义不同，^①联盟党更强调澳大利亚的“西方”属性，主张加强与欧美的传统联系以及美澳同盟关系。^②特别是对华强硬的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和莫里森（Scott Morrison）先后担任总理，他们的立场偏好叠加上联盟党的外交传统，导致澳政府的对外政策出现剧烈转向。同时，民调数据显示以2017年为界，澳大利亚民众对华的好感度和反感度出现了逆转。新冠疫情暴发后，民众对华态度负面化更是达到极值，皮尤民调显示2020—2022年连续三年澳民众对华非好感度超过80%。^③洛伊民调也显示，越来越多的澳民众不再视中国是经济伙伴而是安全威胁，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认为若中美发生军事冲突，澳大利亚应支持美国，而支持中国的仅有约1%。^④可见过去几年的民意变化助长了堪培拉“联美制中”的政策，并与领导层的认知日趋一致且相互促进，加剧了中澳关系转圜的难度。

其次，澳大利亚在身份认同上的“亲西远亚”也使其更倾向于靠拢美国。作为从英国殖民地中独立的国家，澳大利亚天然怀有浓厚的盎格鲁—撒克逊情结，特别是独立后长期奉行的“白澳政策”至今仍对其国家和民族认同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与己同出盎格鲁—撒克逊一源的美英阵营，澳大利亚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和归属感，前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曾称西方价

值观是澳大利亚的立国之本。诚然，20世纪70年代后“白澳政策”的废除和与亚洲国家的密切往来也在催生澳大利亚的“亚洲意识”，甚至连2012年的外交白皮书都被命名为《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⑤但令人遗憾的是，澳大利亚至今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的”亚洲国家，也不被广大亚洲国家接纳其“亚洲身份”。^⑥这种亚洲认同的不足也导致澳大利亚在阵营化加剧的格局下加快了回归西方的步伐。

当然，除了国内因素之外，体系因素也是助推澳大利亚成为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对华围堵第一梯队成员的关键。一方面，澳大利亚在关键供应链上对中美依赖程度不同。诚然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产品——农矿产品的最大进口国，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市场依赖并非美国及其盟友不能替代。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加强了与美、日、印、韩等国的合作，多元化出口结构，主动降低对华市场依赖。美、日等国也十分青睐澳在锂等关键矿产储量上的潜能，多次与澳协商开展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以对冲中国的影响。而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供应链依赖主要是一种技术依赖，比如在信息技术研发、军事科技等领域，除了美国之外，澳大利亚尚难在全球找到另外一家替代方。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缺乏强大的制度缓冲来化解中美竞争带来的压力。尽管澳大利亚已经通过与日本建立“特

① Tanya Plibersek,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The Labor Approach”,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0, No. 5, 2016, pp. 460–466.

② 宁团辉：“政党政治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转变”，《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3期，第105页。

③ “Spring 2022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9,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2/08/PG_2022.08.11_COVID_TOPLINE.pdf.

④ Ryan Neelam, “Lowy Institute Poll 2023”, Lowy Institute, June 21, 2023, <https://poll.lowyinstitute.org/files/lowyinstitutepoll-2023.pdf>.

⑤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 Parliamentary Paper, No. 387, 2012, <https://catalogue.nla.gov.au/Record/615674>.

⑥ Patience Alla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in Asia: Middle Power or Awkward Partner?*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 1–16.

殊战略伙伴关系”、与韩国结成“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打造澳大利亚—东盟论坛、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国际制度来应对大国竞争风险,但澳大利亚既不是东盟等地区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其在印太“结伴”的对象也是对美依赖严重的日、韩等国,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应对大国竞争的制度缓冲较弱,难以对压力形成有效的对冲。

因此,在国内因素初步确立了澳大利亚“联美制中”的战略倾向后,体系因素使这一倾向更趋向极端。澳大利亚不仅成为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五眼联盟”(FVEY)的骨干成员,而且在多个议题上频频对华发难,对华政策陷入了安全化的失焦性和失当性困境,严重冲击了中澳关系。^① 澳大利亚已成为美国盟国中反华意识最为鲜明、姿态最为突出的成员之一,是印太地区“联美制中”国家的代表。

3.2 韩国:从“安美经中”到“亲美疏中”

与澳大利亚类似,中美韩三边关系在近年来也经历了一番大起大落,突出表现在“萨德入韩”事件发生后中韩关系的急剧倒退和韩国对美追随的日益升级。在“萨德入韩”之前,韩国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安美经中”的“浪漫三角”形态,尤其是朴槿惠执政前期,韩国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外交达到顶峰。然而好景不长,“萨德入韩”后中韩关系很快跌入冰点。尽管文在寅总统在任内力图扭转双边关系的下降态势,但未见明显成效。而后担任总统的尹锡悦积极打造“韩美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刻意减少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削弱中国对韩影响。即使韩国在配合美国围堵中国方面的姿态不似澳大利亚那么积极,但其“亲美疏中”的态势已显而易见。

韩国之所以会从“安美经中”转向“亲美疏中”,国内认知偏好的作用与澳大利亚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些许差别。首先,不论是韩国领导层还是民众,近些年来的对华认知都出现了不利

于中国的变化。韩国的政党政治主要体现为保守和进步两大阵营的对立,保守阵营提倡与美国结成强大的联盟,对朝鲜采取强硬的政策;而进步阵营更倾向于对朝和解并寻求与中国的合作。^② 2022年,韩国发生政党轮替,出身保守阵营的总统尹锡悦一改文在寅时代韩国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模糊”的外交政策,展现出鲜明的向美靠拢的姿态。同时,自“萨德入韩”后,韩国民众对华好感度呈现“断崖式”下跌,2022年的对华好感度已不足两成。^③ 峨山政策研究院的民调显示若中美发生冲突,支持美国的民众从2016年的59.5%上升至2022年的85.5%,而支持中国的则从32.6%下降至9.9%。^④ 尹锡悦上任后不利于中国的领导层意向和民意形成叠加,加速了韩国“疏华”的进程。不过,与澳大利亚不同的是,韩国领导层意志和民意的发展并非完全一致,特别是文在寅执政期间,尽管民意动向不利于中国,但进步政权还是努力疏导新冠疫情等引发的民间反华情绪,并规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因此,相较于澳大利亚不断向美靠拢,韩国“亲美”的进程呈现出渐进性和曲折性的特点,配合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程度也不及澳大利亚。

在身份认同层面,韩、澳两国的情况则大有不同,韩国是带有鲜明“双重身份认同”色彩的国家。一方面,自2021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正式将韩国列入发达国家后,“发达国家”的标签成为韩国国民心中的新国家定位。韩国认为其发展水平已与西方发达国家

^① 魏衍学:“‘武装到牙齿’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安全化”,《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11期,第30页。

^② Linda Maduz, “Explaining Korea’s Positioning in the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Simona A. Grano and David Wei Feng Huang eds., *China-US Competition: Impact on Small and Middle Powers’ Strategic Choices*, Palgrave Macmillan, 2023, p.252.

^③ “Spring 2022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9,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2/08/PG_2022.08.11_COVID_TOPLINE.pdf.

^④ “South Koreans and Their Neighbors 2023”, 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April 26, 2023, <http://en.asaninst.org/contents/south-koreans-and-their-neighbors-2023/>.

并驾齐驱,自然也进入西方阵营,如同日本当年成为西方七大工业国一般,尹锡悦迫切渴望参加 G7 峰会就是反映韩国心态转变的明证。另外,尹锡悦上台后特别强调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联结,外长朴振曾表示“美国向来重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价值”,韩美基于此维持长达 70 年的同盟关系。韩中关系虽在经济领域取得飞跃发展,但两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不同,因而合作发展存在一定局限性。^①在“发达国家”心态和“共同价值观”情怀的驱动下,韩国对西方之一员的身份具有相当程度的向往与归属感。另一方面,与澳大利亚的“亲西远亚”以及日本在“脱亚入欧”和“回归亚洲”之间左右摇摆不同,韩国除了对西方的身份认同之外,对自己的“亚洲身份”还是高度接纳的。一来,冷战结束后韩国学术界在重塑历史叙事的过程中,把东亚作为一个地区单位思考的学术倾向明显抬头,^②这种“东亚观”浓厚的历史叙事对韩国民众“亚洲意识”的形塑作用十分深刻,使“作为亚洲的韩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二来,冷战后韩国历任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几乎均以亚洲作为出发基点,如李明博的“新亚洲构想”,朴槿惠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欧亚倡议”,文在寅的“新南方政策”“新北方政策”等皆是主要围绕亚洲国家展开的,这种亚洲本位主义的外交传统也使韩国的“亚洲身份”根深蒂固。

鉴于进步阵营执政期间坚持“战略模糊”的立场以及身份认同上的差别,韩国虽然“亲美”,但不似澳大利亚那般“激进”,特别是在加入围堵中国的地区机制问题上,首尔的态度还存在一定的保留。不过在大国竞争烈度加剧的背景下,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偏向性也愈发突出。一方面,半导体产业一直是韩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 GDP 的贡献明显。然而在这一领域,韩国不仅在芯片设计软件上依赖美国,而且需要从日、荷等国进口芯片制造所需高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半导体材料,这使得韩国半导体产业根本上依赖美国及其盟友,^③且中国在以上领域也面临较大瓶颈,难以提供替代。韩国对中

国在半导体供应链上的依赖主要是原材料和市场,而美、澳等国在提供锂、钨等原材料方面具有一定的替代能力,韩国也有意将半导体的主要出口市场逐渐转向东南亚以降低对华依赖。因此,韩国对美中两国的不对称依赖程度有高下之别,相较于中国,美国对韩国更有更强的战略影响力,这亦为韩国转向“亲美疏中”提供理由。另一方面,在制度缓冲上,韩国面临的制度环境与澳大利亚类似,在对冲中美竞争压力时力度都相对有限。不过,韩国一直是促成签署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积极推手,中日韩 FTA 一旦签订,不仅有利于加强三国间的经济合作,而且能维持地区供应链的韧性与弹性,对冲中美竞争带来的部分负面影响。所以,中韩双方对中日韩 FTA 的积极态度及努力有利于增强韩国应对大国竞争的制度缓冲。

综上,相较于澳大利亚而言,韩国在国内层面比前者具有更加深刻的亚洲认同,官民双方的对华态度也并非始终一致;在体系层面,推动建设的中日韩 FTA 具备一定程度的对冲大国竞争压力的能力。故此,与堪培拉直接的“联美制中”相比,首尔倾向于实行比较间接和隐晦的“亲美疏中”策略,在向华盛顿靠拢的同时,渐进地、有意识地减少与北京间的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尹锡悦上台后大肆推动价值观外交的回归,多次在公共场合高谈“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理念以及对这些理念的高度认同,接手美国主办第三届民主峰会,使韩国的“西方认同”有明显强化的趋势,这一情况再加上保守政权执政和民间对华负面观感叠加、美国拉拢和施压韩国打造排华的半导体供应链体系等因素,未来韩国“亲美疏中”的倾向可能进一步凸

^① “韩外长就对美对华关系强调基于价值观定位”,韩联社,2023年1月8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230108-001600881?section=search>.

^② 安洙英、姜伊威:“从‘东洋史’到‘东亚史’——韩国学界近三十年的历史叙事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第73页。

^③ 李丽、刘宏松:“美韩半导体同盟及其合作困境探析”,《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5期,第40-41页。

显,美韩同盟关系大概率会持续呈现“相互支持”的态势。^①

3.3 印度尼西亚:中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印尼自独立以来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寻求地区和全球地位的提升。但随着“复合竞争”时代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印尼在外交上亦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不过,不同于澳大利亚和韩国出现不同程度“选边”的情况,印尼坚持不结盟的政策,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并依托东盟试图在印太地区开辟出一条中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印尼之所以在“复合竞争”之下仍坚持大国平衡外交,领导层和民众对这一政策的认可与坚持是首要动力。首先,2014年佐科(Joko Widodo)担任印尼总统后,他所属的民主斗争党逐渐成长为国会第一大党,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该党以“潘查希拉”作为政治纲领,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公正,一直坚持不结盟政策。即便冷战结束后不结盟运动影响力下降,其不结盟政策也丝毫未有改变。^②对中美两国,民主斗争党主张保持战略平衡,不存在与任何一方结盟的现象。与此同时,佐科坚持以自由为原则的外交政策,自主决定其对国际问题的态度,不受大国的影响,他的政府在处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时,也展现出既追随又对冲的“一体两面”。其次,民意对大国平衡政策的拥护与政府的立场形成了叠加效应。从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SEAS)发布的2019—2023年的五份年度民调来看,虽然中美竞争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但是印尼倾向于任何一方的态势都不明显。即便要被迫“选边”,印尼对中美两国的偏好度都差别不大。在应对中美竞争的路径上,近半数印尼受访者(46.3%)都主张增强东盟的韧性和团结来抵御大国竞争的压力,而愿意“选边”的比例则最低(6.6%)。^③可见,拒绝“选边站”是印尼官民的一致意见,为其选择开辟“第三条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国内基础。

另外,印尼对自身作为东南亚区域大国的身份认同坚定了其谋求独立于中美之外的外交政策。无论从领土、人口还是经济规模等角度来看,印尼是东南亚国家“天然的领导者”。早在苏加诺时代,印尼就通过举办首届亚非会议彰显自身作为东南亚区域领导的角色,^④其后历任总统皆以“建设名实相符的东南亚领导国家”为出发点,通过发展国内经济、推动东南亚区域主义和引导跨区域治理等方式,积极展现印尼的区域大国的形象。中美竞争开启后,印尼努力将中美都纳入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等多边机制中来,继续维持其东南亚大国身份。诚然,实现民主化之后,印尼有意通过倡导民主的角色来模仿西方自由规范。但是反殖民主义已成为印尼民族精神的深刻烙印,使其难以融入西方阵营并对改革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持支持态度。^⑤

尽管国内因素的支撑为印尼在印太大国竞争之下努力开辟“第三条道路”提供了重要条件,但中美竞争烈度的加剧对印尼独立自主地位的束缚亦不可小觑。一方面,美国回归亚太后加强了对澳大利亚的“借助”,这使与堪培拉有地缘竞争关系的雅加达心存焦虑,担心华盛顿与其竞争对手关系的加强会降低自身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印尼认为中国崛起存在不确定性,对中国将如何利用新获得的财富和军事

^① 赵懿黑:“美国‘印太战略’下美韩海洋安全合作研究”,《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3期,第41页。

^② Jonah Blank, “Regional Responses to U.S.-China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 Indonesia”, *Rand Corporation Research Report*, June 3, 2020, <https://www.rand.org/t/RR4412z3>.

^③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3 Survey Report”, ISEAS, February 9, 2023,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5/07/The-State-of-SEA-2023-Final-Digital-V4-09-Feb-2023.pdf>.

^④ 郑先武著:《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页。

^⑤ Moch Faisal Karim, “Middle Power, Status-seeking and Role Conceptions: The Cases of Indonesia and South Korea”,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2, No.4, 2018, p.354.

实力感到焦虑,^①尤其担心中国会凭借对印尼的援助,在联合国投票、南海等问题上对其提出政治要求。^②

不过,虽然体系层面的压力增大,但不同于澳大利亚和韩国,印尼在供应链依赖结构上更偏重于中国,且拥有东盟这一坚强制度缓冲,为其坚持“第三条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其一,尽管近年来印尼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产业发展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的数据看,印尼出口以初级制成品(矿产品、动植物油脂等)为主,进口则主要是工业制成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等)。^③相较于处于价值链中上游的韩、澳等发达国家,印尼对工业制成品的依赖更甚于对技术的依赖。而中国相较于美国,尖端技术虽有不及但拥有强大的工业制造力,向印尼提供物美价廉、种类齐全的工业制成品的能力是美国难以替代的。此外,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和出口目的国,而美国只是第二大出口目的国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国,印尼对美国的市場依赖亦不如中国。印尼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程度高于美国,所以在美国要求“选边站”时拥有比韩、澳更充分的拒绝理由。其二,东盟长期在区域合作和共同体建设中居于“中心地位”,而“复合竞争”对这一地位造成较大的冲击。为维护“中心地位”,在印尼的推动下,2019年东盟发布了《东盟印太展望》,强调了印太秩序下东盟的中心地位,试图以发展为导向的方式来扭转中美间的竞争态势,强调互利合作。^④东盟的表态反映了各成员国对中美竞争的基本态度,一定程度也缓解了印尼的“选边”压力。以东盟为核心的各种“东盟+”多边机制将中美等大国等纳入进来,使它们之间相互制衡,稀释大国的影响并为竞争树立了行为规范。^⑤

因此,尽管中美“复合竞争”给印尼带来的战略压力不次于澳大利亚和韩国,但是雅加达拥有比堪培拉和首尔都更明确的地区身份认同,且无论领导层还是民意,平衡与北京和华盛顿间的关系是二者共识。同时,在供应链依赖

结构上,印尼对华依赖程度更甚于美国,且印尼和东盟相辅相成——印尼为东盟应对中美竞争提供智识领导,东盟反过来成为印尼应对中美竞争的“缓冲器”。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印尼超越了澳、韩的站队外交,既保持了与中美的等距离关系,又主动引领东盟探索大国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通过对以上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尼三个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国内认知偏好和国家身份认同两个国内政治因素在初步塑造印太“中等强国”选择偏好时影响显著。领导层和民意相对亲美,以及更具西方认同的国家容易偏向美国;反之则倾向于走中间道路或对华友善。当然,选择偏好的程度也与国内认知的同质化程度与两因素的叠加程度密切相关。此外,进入“复合竞争”时代后,大国竞争烈度的加剧压缩了“中等强国”选择的空间。在此情况下,“中等强国”对美、对华的依赖结构,以及体系层面有无坚强的制度缓冲就会左右其最后的战略抉择。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尼在国内和体系两个层面的不同情况及各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使这三个国家在“复合竞争”时代做出了三种不同的战略选择。

① Natasha Hamilton-Hart and Dave McRae, “Indonesia: Balanc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iming for Independence”, The 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 November 2015, <https://united-states-studies-centre.s3.amazonaws.com/attache/31/5b/54/2d/26/5f/a0/c3/4b/24/b6/c4/c2/50/14/ad/MacArthur-Indonesia-ONLINE.pdf>

② Philips Vermonte, “U.S.-China Competition and ASEAN: A View from Jakarta”,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 January 2019, <http://www.cscap.org/uploads/docs/CRSO/CSCAP%202019%20Regional%20Security%20Outlook.pdf>

③ 吴崇伯、李琰:“RCEP 框架下印尼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与地位——基于附加值贸易的分析”,《南洋问题研究》,2022年第1期,第59页。

④ Hoang Thi Ha,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Old Wine in New Bottle?” *ISEAS Perspective*, June 25, 2019, pp.4-6.

⑤ Natalegawa M., *Does ASEAN Matter? A View from Within*, ISEAS Publishing, 2018, p.90.

表3 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最终抉择

	国内政治层面		国际体系层面		战略选择
	国内认知偏好	国家身份认同	依赖结构(供应链)	制度缓冲	
澳大利亚	官民一致亲美	“西方”	更依赖美国	缺乏	联美制中
韩国	官民意见不一——一致亲美	兼有“西方”和“亚洲”	更依赖美国	有限	亲美疏中
印度尼西亚	平衡中美	东南亚区域大国	更依赖中国	有	中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四、结 论

随着中美在印太地区的互动进入“复合竞争”的阶段,“中等强国”在两大国间的战略选择及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诚然,过去“中等强国”可以通过平衡中美并利用它们的竞争,扮演未来国际体系驱动力的角色,^①但“复合竞争”时代大国竞争烈度的增大已开始裹挟“中等强国”选择,减少它们灵活应对的余地。由于国内认知偏好和国家身份认同存在差异,对中美的供应链依赖程度有高下之分,对冲大国压力的制度缓冲亦有强弱之别,印太“中等强国”在中美间战略选择的分化态势已比较明显。当然,这种分化是国内和体系层面因素互动造成的结果,“中等强国”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中国可以通过推动某些因素的改变,主动引导“中等强国”的行为,构建有利于己的国际关系和战略环境。

根据对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尼三个案例的分析,若要使印太“中等强国”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甚至是对华友善,中国可考虑以下几方面的现实举措:一是既要加强与印太“中等强国”政府层面的沟通,提升政治互信,又要重点推动公共外交,改善对象国民众心中的中国形象,努力使对华友善的官方立场和国民意志形成同频共振。二是弱化意识形态上的身份差别,在印太国家中营造具有鲜明区域特色、提倡多元化和文明互鉴的“亚洲认同”,使之与拜登

政府兜售的“民主对抗威权”的二元对立式地区秩序叙事形成对比,增进印太国家对“亚洲认同”的接受度。三是全力推进核心技术攻关,破解关键供应链上的卡点、断点和堵点,争取在部分领域实现对美技术替代,为印太各国提供更多元的供应链选择方案。四是继续增进与东盟的合作,大力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各种包容性多边机制的建设。此类多边机制的发展与壮大,不仅能为印太“中等强国”提供更强韧的制度缓冲,而且也为中国创造了加强对美博弈、推动构建更有利于本地区国家共同发展的新型地区秩序的重要外交空间。^②

总之,在“复合竞争”时代的中美战略博弈中,“中等强国”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两国都要争取的力量。鉴于美国正通过“印太战略”对“中等强国”进行拉拢和分化,中国应在厘清“中等强国”战略选择逻辑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主动参与其战略行为的塑造,防止其被美国的战略裹挟,促使其成为能与中国携手共建多元文明、开放包容的地区新秩序的重要伙伴。

责任编辑 邵雯婧

^① Gabriele Abbondanza, “Whither the Indo-Pacific? Middle Power Strategies from Australia, South Korea and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8, No.2, 2022, p.404.

^② 张洁:“东盟中心主义重构与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3期,第123页。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trategic Choices of Middle Power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in the Era of Comprehensive Competition

ZHANG Chi¹

(1.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China*)

Abstract: The launch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by the United States has opened the prelude to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seen the intensification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e intensification of frag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prominence of the competition of technology and supply chain capabilities, the middle power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re facing increasing pressure to choose sides and have their differences in the strategic choi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a few reasons of taking these actions. Firstly, the perception preferen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at the domestic level determine the preference of the middle pow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condly, the supply chain dependency structure and an institutional buffer to hedge against the pressure of great powers at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evel affect the degree of polarization of preferences. The policies of Australia, South Korea and Indonesia illustrate the mechanism and logic behind the strategic choices of middle powers. Therefore, by creating a China-friendly perception,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the Asian identity in the region, providing more diversified supply chain options and continuing to support the ASEAN-centered multilateral regional order, China should strive to promote the Indo-Pacific middle powers to maintain strategic neutral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ild a China-favorab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trategic environment.

Key words: Indo-Pacific; Middle Power; Comprehensive Competition; Strategic Choice